

历史在笔墨间复活

——谈李开元与黄仁宇

■文/杜雷

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见自己；当代，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清现实。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在秦始皇手里诞生。但是，她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当时，秦始皇突然死去，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叱咤风云；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这一段秦失其鹿、群雄竞逐的历史突然而猛烈，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谜团，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断言残迹。历史能够复活吗？复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复活的历史》一书中，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带领我们穿越2000多年的时空，揭开历史尘封的帷幕，让千年故事鲜活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层累形成的古代史。顾先生以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代史，经过了历代文人不断地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而是添加了历代所喜好的口味。为了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实。李开元，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带着种种疑问，行走于古战场。如同老练的侦探，穷搜史料，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让久远的历史一一复活起来：刘邦与秦始皇，是两代人吗？陈胜的大军为何在戏水止步不前。赵高，真的是太监吗……在历史的行进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在那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在李开元笔下，2000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上演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就如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

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

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旧地。自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面世以后，我们对中国历代的历史地理，才有了可以按图索骥的可靠依据。在李开元眼中，历史的真相是学者走出来的。地理空间是历史的基本要素，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锅迷糊的酱汤，不辨东西南北，纯粹纸上谈兵。山川气候，道路城邑，民俗风情，都需要去走，去看，去感受，去触摸才能晓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长河中流逝的历史，往往会在空间中留下痕迹。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人们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

我们随着作者前行，去丰县沛县，寻访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去芒砀山怀古，去听听金戈铁马，斧钺之鸣；去临潼始皇陵，哀泣亡秦的子孙；远望驰道深入阿房，感慨秦帝国兴起之暴，瓦解之急。当我们行走在渭水骊山之间时，复活的兵马俑军团就在眼前，云水濛濛中，仿佛在我们重演一场史书失载的大战……李开元是历史的行者，当行走在历史当中时，历史就复活在他的心中，他将复活的历史停留在了纸上。

充满魅力的笔调、独特的措辞和丰富的想象力，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让历史在笔墨间复活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黄仁宇之前，历史在普通读者眼中，即使不是死的，也是老的，暮气沉沉，充满了

死板的教条与说教。读到黄仁宇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1980年代中华书局版的《万历十五年》。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黄仁宇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得远不顾近”。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

明史自上世纪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显学”，尤其是有关晚明和明末的历史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但是初读《十五年》，仍然如沐春风。不管你对他的研究结论同意与否，但是他的叙事角度和研究方式，都能予人启迪和深思。

《万历十五年》之后，黄仁宇先生又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21世纪》，以及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大历史观：其一，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社会必经的组织和运动。农业社会初期出现封建制度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而工商业兴盛以后，数目字管理成为技术必需之时出现的资本主义运动，同样不可超越。其二，综观中国历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帝国。第一帝国为秦汉时期，初创的帝国呈现欣欣气象，无论是开边拓土还是设定各项制度；第二帝国为隋唐两宋，帝国进入成熟和强盛时期，强唐富宋为历史之最；第三帝国为明清时期，帝国制度发展的空间已经走

弱，衰退已经不可避免，而洪武型保护落后产业的财政更是埋下了祸根。其三，开国君主的法统（道统）主导思想设计影响深远。洪武时期的治国精神导致了明朝的国际空间的战略收缩和国家的积贫积弱，前者由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可以屡次侵略而不是大明征讨可见一斑，后者则可通过与富裕的宋朝相比而看出；与隋唐进攻性的外向型的帝国运作相比，明清防守性内向型的主导精神，直接的导致了晚清的全面被动和挨打。

史学著作要想赢得读者，关键在于新，观念观点要求新，写法更要求新。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黄仁宇身临其境地述说着万历皇帝的最后结局，愤怒与哀怨在地下陵寝中回荡：“今天，中国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定陵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他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的身旁。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这里的地下玄宫，加上潮湿霉烂的丝织品和胶结的油灯所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天哪！历史原来可以这么写，这么读。

历史的东西能告诉我们什么？不知道。但，我一直以为应该有这样的境界，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一直联想到很远的相似的事件，看看历史上所谓的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可以借鉴一番。更多的时候，你看见眼前的，想到发生过的事，是不是很想发笑或者深思呢。

司马光的人品和家风

司马光生性不喜华靡，素以俭朴自守。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住在城郊西北一个小巷中，居所极为简陋，仅能挡风遮雨。夏天为避暑热，他请工匠挖地丈余，用砖砌成地下室，读书写作其间。大臣王拱辰当时亦居洛阳，所建宅第凌天高耸，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邵康节则打趣说：“一人巢居，一人穴处！”

司马光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就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仁宗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赐予司马光等大臣一笔价值百余万的金珠。司马光考虑到国家财力不逮，便领衔上书请免。力辞再三未果，只好将自己那份珠宝交谏院充作公费，金钱接济了亲友，自家分文未留。司马光为官40年，仅有薄田三顷，所得薪俸大多周济了穷人。其妻去世时，竟拿不出钱来办丧事，只得典当薄田置棺埋葬。司马光临终床笫萧然，唯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吕公著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司马光府上有个仆人，30年来一直称呼他“秀才”。前来拜会的苏轼，听后觉得不恭，就教他以后改称“大丞相公”。作为称呼，“相公”是指“位居宰相之职并享有公爵爵位的人”。司马光听仆人突然改口，吃惊地问他谁

教的，仆人如实禀告。司马光说：“好好一个仆人，被苏东坡教坏了。”在司马光看来，“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不仅自己不吝身份，也不希望家人为世俗所染，变得势利起来。

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在封建社会里，因势焰熏灼使然，宦官府邸中人，即便车夫、门子，身价也非同一般。如果家规不严、门风不正，他们就会倚权仗势，寻衅滋事，有恃无恐，横行不法，甚至贪污受贿，作奸犯科。据《清仁宗睿皇帝实录》记载，和坤的大管家刘全，查抄资产竟至20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即便在今天，领导“身边人”犯罪的案件也时有耳闻，这在司马光家人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一天，司马光经过独乐园，见新盖了一间厕所，就问守园者，建房的钱是从哪里得来的。守园者答，是我把游人给的赏钱积攒起来的。司马光说，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守园者说，难道只有相公您不要钱？守园者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句反问，就把主仆双方的为人都说清楚了。赏钱属于个人正当得利，留为己用合情合理，守园者却用于公共设施，这显然超越了一般职业操守。也许是我们对那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行径看得太多了，

愈发觉得这位守园者可敬。他能这样做，无疑是受到司马光的熏陶。人格的魅力有多大，影响力就有多大。

在司马光手下当差，无势可仗，无光可沾，也无油水可捞，显然要比其他公府豪门清苦。但因主人夫妇待之以诚，持之以礼，从不欺凌打骂，他们活得自在有尊严，心里感到踏实，这可不是金钱能够买得来的。他们不仅安贫若素，没有怨言，而且也像主人一样平和敦厚，不慕奢华，不图富贵，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

行胜于言，温公家风的形成，很大程度源自身教。“修齐治平”四字，司马光践履得十分到位。他深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并视为“大贤之深谋远虑”。因此在身教同时，非常重视言教。《训俭示康》一文，就是司马光专门教诲继子司马康的。由于身教言教并重，其家族后人也都以贤德立身，绝无“官二代”之累。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6种457卷。影响力大的除《资治通鉴》外，就是《家范》了。《家范》广泛收集了治家有方的实例，系统阐述了家庭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处世之道，为历代推崇的家教范本。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

（转自《学习时报》）